

# 晚清女學中的滿漢矛盾

## ——惠興自殺事件解讀

• 夏曉虹

1905年歲暮，先是陳天華為抗議日本文部省發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於12月8日憤而在東京蹈海；隨後惠興因辦女學款絀，12月21日於杭州家中服毒。表面看來，二人均係為教育問題殉身，實則與陳天華爭國權背後的民族革命意識同出一源，惠興的存女學也大有深意。

1905年歲暮，中國有兩位男、女志士相繼在國內外自殺，事件震動全國，餘波經久不息。先是陳天華為抗議日本文部省發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以喚醒國人的救亡意識，12月8日憤而在東京蹈海；隨後惠興因辦女學款絀，12月21日於杭州家中服毒，遺書當道請撥常年經費。表面看來，二人均係為教育問題殉身，實則與陳天華爭國權背後的民族革命意識同出一源，惠興的存女學也大有深意。

### 一 解不開的死結

自1644年清兵入關，建立全國性政權，滿漢矛盾便成為糾纏清朝三百年歷史的解不開的死結。以邊地的少數民族統治中原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華夷之辨」思想的頑強抵抗；加之滿清權貴汲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從強迫漢人改變服制剃髮留辮開始，刻意維護滿人的民族特徵與特權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對立情緒。迨至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思潮自外而內，流行

全國，民族意識更與國家思想合為一體，成為革命派鼓動救亡的強力手段。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正是以民族革命推進政治革命的集中表述。

處此情勢下，為維持統治權不致失落，滿清王朝一方面不得不順應潮流，謹慎地逐步開放體制改革的門戶，給漢人官僚以更多的位置，努力消泯民族敵對情緒；另一方面，這種讓步也加深了滿人自身的民族危機感。從當時的報刊上，我們可以讀到立場迥異的言說。

1904年在《警鐘日報》發表的〈論中國民族主義〉，可作為革命派「排滿」主張的經典文獻來閱讀。此文開篇即斷言：「今之世一民族競爭之天下也。」根據「舍民族則無國家」的道理，作者認為，處於今日「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排滿革命」必不可免：

民族國家者，以同一之種族，同一之言語，同一之習慣，同一之宗教，造成同一之性質，同一之理想，而集合其能力，以組織政體，而統治人民，以為生存之要具者也。是故以同族而

排異族，以同國而排異國。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排於外者不勝。

革命派之倡導民族主義，本是以「排滿」為救國的「起死回生之絕妙藥」，最終目的仍在抵抗西方「新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所謂「故今日而欲救中國，舍擴張吾民族主義，其道莫由」<sup>①</sup>，也即是期望由民族的競爭達致國家的爭勝。因此，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才會以「排滿」（驅除韃虜）作為政治革命與建立新民族國家的起點。

至於朝廷一方所作出的最大讓步，當屬允許滿漢通婚，打破為保持血統純粹固守已二百餘年的厲禁。1902年2月1日的「上諭」<sup>②</sup>無可奈何地宣布「俯順人情，開除此禁，所有滿漢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結婚」。不過，這一「寬宏大量」的諭旨實不足以收買久失的人心。尚未與清廷離心離德的漢族官員仍在不斷抱怨「滿漢界限仍分晰太清」，具體而言：「民部奏補之內外廳丞，內城滿籍，外城漢籍；所有以下之員，內城亦滿人佔多數，外城亦漢人佔多數。而禮部奏補之丞參，亦係兩滿兩漢。其餘外部、農工商部、民政部等侍郎之缺，亦皆一滿一漢。」<sup>③</sup>也即是說，凡屬重要位置，仍多用滿員，由此表現出對漢人根深柢固的不信任。各部侍郎的任命雖似乎滿漢均等，但最高的官階尚書卻只以滿人充當。這還是1907年官制改革後的格局，如此結果，自然不能令漢族官紳滿意。

應該說，「民族調和論」在晚清報界實佔據主導地位，排除政治派別鮮明的報章不計，以《申報》、《大公報》等中性報刊為代表的「公共空間」，應該說是體現（或曰引導形成）了這樣一種社會輿論與主流意識。《大公報》主

人英華（斂之）雖為滿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視同仁之心，且崇信變法改良，思想開明，因此也以融合滿漢畛域為救國良策。如1906年3月7日發表在《大公報》的〈論建設學堂宜除滿漢之名目〉，雖為「來稿」，卻刊登在相當於社論的「言論」欄，這起碼表明其得到了報社主持者的贊同。論者秉着「調和滿漢之方針」，批評滿人「辦理學堂者仍狃於滿漢之成見」。其深憂大患正在，「以同為一國之人，而先自分支別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滿革命種種狂悖之謠傳莫殺其勢而息其波」。以融合滿漢為防止革命的手段雖未必現實，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謂良苦。

不過，如英斂之一般主張的滿族知識者畢竟為數不多，留學日本的滿洲貴族少壯派且由於直接感受到革命派無所顧忌的排拒，而生發出更為強烈的敵意。辛亥革命後組建「宗社黨」的良弼，1904年留學日本時，即「以滿漢界限，故與漢人留學者大相水火，即漢學生亦莫不反對之」，於是上書執政者，「請將漢人中有志之士盡中以法，為一網打盡之計」，並「請政府限制漢人入仕，階級毋得過三品以上」<sup>④</sup>。顯而易見，此舉不僅無助於滿洲政權的自救，反會加速漢族官僚集團的離心，因而在滿清上層雖獲得同情，卻未取得支持。

良弼以強硬姿態表現出的滿人憂患意識並非空穴來風，而在滿族基層社會中實有根柢。1906年12月13日，年僅十八歲的滿洲正白旗普通旗人曾某，便在遼陽家中以自刎的極端方式，表達了對滿族前途的悲觀絕望。遺言開篇便道明死因：「吾今之死非為他故，痛吾滿族之將亡，欲救而無其力，兼境域、學問說，他年終不免為亡國之奴隸。吾寔恥之，不得不死。」遺書痛心疾首於滿族的「禍懸眉睫」而

「民族調和論」在晚清報界實佔據主導地位，以《申報》、《大公報》為代表的「公共空間」，應該說是體現了這種社會輿論與主流意識。1906年3月7日發表在《大公報》的〈論建設學堂宜除滿漢之名目〉，論者秉着「調和滿漢之方針」，批評滿人「辦理學堂者仍狃於滿漢之成見」。

不自知，追根溯源，直指漢人維新派的政治宣傳為傾覆之禍胎：

汗族自康、梁跳梁，海外編書著報喚醒國魂以來，亦漸漸如日出海，如劍出匣，蓬蓬勃勃，有風雲氣矣，革命排滿之風潮日高。而我滿族醉生夢死於荊天棘地之中，雷霆擊其頂，刀鋸臨其身，鬼蜮瞰其旁，虎狼踞其側，而無所謂恐懼，無所事補救，惟抱其南非洲黑奴之人格，而待後日為他族之奴隸。

由此危言預斷，「三十年後吾種族得為奴隸，百年後吾種族將至滅絕」。而曾氏所謂「亡國」、「他族之奴隸」，所慮者乃在近不在遠，用《盛京時報》編者的話說，即是「但憂滿族而外視漢族」。

曾某之以「國家」與「種族」合一，恰與維新派、革命派的嚴別「朝廷」和「國家」針鋒相對，全然出於維護滿族統治利益的考慮。但其人並非顛預無知的頑固守舊者，從遺言中為滿族設計的自救方案，即可見出曾氏實為維新改良之同道：「總而言之，我種族必當一刀兩斷，推翻數百年種種之劣根性，而吸納新精神、新道德，重鑄國體，使吾七千萬人民皆有自立為國之人格，然後可以獨立為國，亦可與汗族共立為國。若此大問題，除求新學而外，吾恐無特別妙法以籌之矣。」<sup>⑥</sup>

此一事例最好不過地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義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漢族革命家，也包括滿族知識者，雙方都以勢不兩立的姿態對待滿漢矛盾。因而，溫和派「民族調和」的聲音雖更具優勢，卻無關大局。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滿漢之爭既與國家權力的更迭不可分割，期望獨攬大權的滿族利益集團與已開始覺醒的漢民族之間的衝突於是無可避免。在雙方的對峙、相爭中，曾氏其實對滿族的自新並不

抱希望，他的選擇自殺並焚毀精心撰寫的《滿族興亡見微論》等著作，表明他對這一民族鬥爭的結局，即滿族統治全國權力的喪失已了然於胸。終清之世，滿漢矛盾到底難以彌合。

## 二 「旗女亦為彼族興學乎」

假如在上述背景下閱讀有關惠興辦學的資料，便可以有新發現。

惠興1905年12月21日自殺後，《申報》於12月30日即刊出題為〈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的消息，詳述其死情：

杭州惠興女士為故協領崑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歲夫亡守節。因讀南皮（按：即張之洞）《勸學篇》，大有感奮，遂以提倡女學自任。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當地之有聲望者多人，商論創辦學校之事。是日，氏忽當眾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為記念。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遂於九月十六日開校。校中經費，雖杭州都統德捐洋四十元，又撥公款八十元，留東八旗同鄉會會員捐洋百元，端午帥隨員喜捐洋五十元，八旗眾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統計約得三百餘元，卒以無長年的款，支持甚難。今秋復以款絀，致課期時有間斷。氏以此校無起色，由於無長年的款，而請款頗費躊躇，鬱鬱者非一日。繼期請款之必得，遂密繕函八封，藏於桌內，復繕稟一扣，開辦女學四柱帳單一紙，預先服毒，欲乘輿赴兩堂遞稟。家中人見其神色有異，繼而查得茶碗中有煙迹，遂大嘩，喚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臨氣絕時，開目盡力言曰：「此稟遞上，有長年經費矣。」遂

1906年12月13日，年僅十八歲的滿洲正白旗普通旗人曾某，在遼陽家中以自刎的極端方式，來表達對滿族前途的悲觀絕望。此一事例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義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漢族革命家，也包括滿族知識者，雙方都以勢不兩立的姿態對待滿漢矛盾。

死。年三十五歲，時為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這篇文章最感動世人處，全在女士辦學的不屈不撓，直至奉獻生命。《申報》之以「為女學犧牲」、《東方雜誌》之以「殉學記」<sup>⑥</sup>表彰其事，着眼點均在惠興創辦女子教育的熱忱血誠。於是，將其作為晚清民間女校辦學艱難之例證來引述，或推崇其人為女子教育的志士、先驅，均屬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如此談論惠興自殺的意義仍不完全。被上海報界有意無意忽略的惠興的身世，其實與惠氏以決絕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度辦學大有關係。《東方雜誌》雖正確地報導了惠興所辦學校的名稱——貞文女學校，卻將其出身滿人的社會關係剔除得乾乾淨淨，言其家世，也只有「早孀居」一句，反不及《申報》據傳聞之詞，徑書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更得精髓。女學既為旗人所設，出資捐助者盡為八旗中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令人感覺奇怪的，倒是該校的誕生似乎默默無聞，並未引起新聞界的關注。連專門設立「各省教育彙志」欄目、熱心報導各地女學消息的《東方雜誌》，也竟然遺漏了近在鄰省的貞文女學校的動態。倒是將「本報十大特色」之第一條標榜為「為民族主義之倡導者」<sup>⑦</sup>的《警鐘日報》，戲劇性地留下了些許蛛絲馬迹。

《警鐘日報》因大力鼓吹「排滿革命」，以之為第一義，故雖熱心提倡女子教育，終究將其從屬於「民族大義」。即如1904年，已故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羅應旒之妻皮氏專程從四川來京，兩次向學務處遞稟，呈請代奏振興女學及請派遊學摺稿。《警鐘日報》儘管全文登載了兩篇奏稿，卻又以其出身滿族，而在文前的「本社案」

中，特為讀者準備了一副「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東胡賤種，寥寥五百萬人，蟠踞上國，踐其土而食其毛，固已咕吁飽死，無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謂學也。乃豁然光明，發見高岡一鳳。如此摺稿，使我漢人讀之，當若何驚心動魄者。急登之，以為二萬萬女同胞勸。」<sup>⑧</sup>持此立場，其報導滿人興辦女學堂，自然亦納入民族主義的敘述框架中。

該報1904年秋冬間，有兩則短訊值得注意。10月22日的〈女學激成〉所述相當簡單：「有旗營某某之女，前在杭州女學堂報名。校中見係旗人，命其約集女子籌款自辦。其屋宇器具聞已備齊，定於本月內開課。惟教員及常年經費無從着落，將來恐成畫餅。」半個月後，11月8日，又有〈旗女亦為彼族興學乎〉一條，事實與前述無大出入，而更加詳細：

旗籍某女士前赴東平巷女學報名，該堂全體以非我族類，屏之不納。該女歸而發憤，極力運動同旗，籌得千金之款，現已賃屋某處，即日開辦。章程規則亦頗有次序。屏聞有某旗員之夫人允助常年經費，俾不至半途輟學云。

通訊雖未揭示旗女及所辦學校之名，但依據前引《申報》文字，惠興創立的學校係於「九月十六日開校」，換算為西曆，即是10月24日，正與《警鐘日報》所載情事相合。〈女學激成〉見報時，該校尚在籌備中，故有「定於本月內開課」之說。後一則消息雖發布於已開學後，卻因滬、杭兩地間隔，而有「即日開辦」的滯後語。此外，揆情度理，1904年，清廷尚未頒行女學堂章程，各地民辦女校本就稀缺。以人口並不算多的杭州駐防旗人，擁有一所女子學校已足夠先進，本不可能出現

《申報》、《東方雜誌》以「殉學記」表彰惠興辦學的不屈不撓，直至奉獻生命，着眼點均在惠興創辦女子教育的熱忱血誠。不過，被上海報界有意無意忽略的惠興的滿族身世，與惠氏以決絕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度辦學大有關係。

雙峰並峙的局面。因此，兩條簡訊的主人公只可能是惠興，發憤而激成的女校，也只可能是貞文女學校。

明瞭此一段前因隱情，方可理解惠興辦學為何抱定勢在必成、以死力爭的決心，那種剛烈義俠氣概原是受漢人排滿的刺激而發生。再來細讀惠興留與學生的遺書，對其間含蓄的話外音便可心領神會<sup>⑨</sup>：

眾學生鑒：愚為首創之人，並非容易。自知力薄無能，初意在鼓動能事之人，如三太太，鳳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熱心創此義務。誰知這幾位，都厭我好事。唉！我並非好事，實現在時勢，正是變法改良的時候。你們看漢人創興學務，再過幾年，就與此時不同了。你們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樣，這兩年是怎樣啊！我今以死，替你們求領常年經費，使你們常常在一處上學。……你們不必哭我，只要聽我一言，以後好好事奉先生，聽先生教訓，總有益於身的。與外人爭氣，不要與同部人爭意氣，被外人笑話。話長心苦，不盡所言。十一月二十三。

其絕命書中所表達的憂慮，正與遼陽曾某相同。惠興也領悟到「變法改良」為時代潮流，滿族如不思變革，絕無前途。這一民族焦慮在與「漢人創興學務」，知識日開、民氣日漲的對比中，更加強化。「再過幾年，就與此時不同了」的隱語，如果借曾氏「以今日我種族之精神無事卜之，吾敢斷言，三十年後，必為他族之奴隸」的警告發明，並無不適。因而，惠興所謂「外人」也與曾氏的「他族」同義，指向「漢人」而非洋人，這在與「同部人」（而非同國人）的對舉中，內涵界劃得尤為明確。就遺書而言，即使指稱惠興之死乃是

細讀惠興留與學生的遺書，不難看到她也領悟到「變法改良」為時代潮流，滿族如不思變革，絕無前途。這一民族焦慮在與「漢人創興學務」，知識日開、民氣日漲的對比中，更加強化。說惠興之死乃是憤慨於滿人的自私、內爭而無合群意識，也不算過甚其辭。

憤慨於滿人的自私、內爭而無合群意識，也不算過甚其辭。

何況，從惠興逝後接辦女校的貴林口中，此說也可得到證實。1907年，貴林應邀在北京演說時，即如此述說惠興之死：「惠氏之死其原因有三：（一）已捐之款收不齊；（二）同志同事之規避；（三）內部譏笑，外界謗毀。」並稱，此乃「兄弟以前所不忍言者」<sup>⑩</sup>。而除了「外界謗毀」或許關涉漢人的排詆，所有三條死因都與旗人群體的冷漠有關。貴林之所以「不忍言」，也正是由於來自同種族人的打擊是置惠興於死地的主因。

### 三 江南之士夫不若河北之俳優

耐人尋味的是，惠興死後，南北學界、報界反應之不同。《申報》雖在惠興自殺後九天即作了迅速報導，且頗翔實，接下來卻是一片沉寂。將近三個月後，該報終於出現了一則來自京師的短訊，敘述北京各界對惠興之死的反響，可又將其名錯成「蕙馨」<sup>⑪</sup>。同在上海的《東方雜誌》也沿襲了這一錯誤，關於惠興自殺的專稿竟以〈蕙馨女士殉學記〉名篇，而其時距惠興去世已歷半年。此一報一刊本踞江南新聞界首座，偏偏在有關惠興寥若晨星的文稿中，連基本事實尚有出入，由此亦可見南方士紳、教育界對其死事的冷漠程度。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滿清政權的統治中心北京及其周邊地區。惠興歿後，得知消息的《北京女報》主人張筠蕙很快即在陶然亭為之開會追悼<sup>⑫</sup>；緊接着，2月2日，在北京淑範女學校又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會，參加者達四五百人。按照《順天時報》記

者的說法：「統計先後到會的，除本女學校學生，和各女學堂學生，並眾女賓外，所有各男學堂學生，及學堂教員，報社記者，一切維新志士，凡知道這開會事的，九門內外，無論東城西城南城北城，不分遠近，都一律親身到場。」<sup>⑬</sup>因此，這次集會也可以說是北京新學界的一次大聚會。

惠興的生平事迹也很快成為各報關注的熱點。《順天時報》1906年2月8日刊出了該報白話記者楊廷書(志伊)演述的〈補記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傑歷史〉，推許惠興為「中國六千年來女界第一偉人」。《大公報》則先於3月14日發表了浙江武備學堂總辦三多的〈記惠興女傑為學殉身事〉，7月19日又載錄了滿族著名文人、內閣中書金梁的〈擬請代奏為惠興女士請旌摺稿〉。作傳者無一例外，均將最高的讚美詞獻給了惠興。而經過京、津各報白話、古文乃至駢體文的反覆宣說，惠興的義烈行事遂在北方廣為人知。

不只是報界與學界聞風而動，為感動大眾，捐款助學，戲曲界實際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906年3月13日的《大公報》已預告：「都下鞠部代表因浙杭惠興女士之問題，大動感情，稟請官府，定於三月初五、初八、十二計三日內，在湖廣會館演戲，所收戲價，悉數匯寄杭州貞文女學校，以資經費。」記者不禁讚歎伶人「熱心學界，一至於此，庶可為士大夫之向導乎」<sup>⑭</sup>。其中，北京玉成班班主、京戲名演員田際雲(藝名「想九霄」)表現尤為出色。他不僅與《北京女報》實際主持人、主筆張毓書(展雲)共同發起創辦了「婦女匡學會」，而且將惠興事迹直接搬上了舞台。上述三天的演出活動，便是婦女匡學會的第一次正式亮相。1906年4月1日、2日，由其擔任主角的《惠興女士傳》也首次在福壽堂

開演，每次先有演說員對眾演說。以後，此戲又移至廣德樓上演。5月26日開戲之前，也安排了三志士講演，內中張展雲演說的題目即是「惠興女士全傳」<sup>⑮</sup>。

這種演戲加演說的方式，因鼓動性強，在當年頗能產生感發觀眾的效力。5月27日的戲園中便出現了「忽聞哭聲起於南樓之下」，且「大號不止，警兵聞知，即前去勸解，方始停哭」的一幕。而「細詢原由，實因觀劇觸發感情之故」。於是有人評論說：「北京戲園二百餘年，此乃感動之第一聲也。」<sup>⑯</sup>由於受到歡迎，反響強烈，天津天仙茶園老闆趙廣順也專程赴京，「特約田際雲將所有演《惠興女士》原戲角色至津演唱」，「並請學界諸公入座觀劇」。該戲8月28至29日在天津連演兩天，亦大獲成功<sup>⑰</sup>。

為配合此戲在廣德樓的上演，1906年5月27日，《順天時報》又專門發表〈請再看重演《惠興女士傳》文明新戲〉的文章，為之大造聲勢。此後，遠在瀋陽的《盛京時報》刊文提倡戲曲改良，也以田際雲編演的新劇為典範<sup>⑱</sup>：

所有戲班班主，須延聘通人，擇古今事迹之有益人心、足開民智者，編為新詞，如北京《惠興女士》之類。藉行樂以教化愚蒙，用補學堂之缺陷，於世道人心，當不無裨益也。

在輿論界的一致叫好聲中，田際雲也再接再勵，趁惠興的後任貴林來京之際，於1907年5月8日再次在廣德樓搬演全本《惠興女士傳》。演出完畢，貴林發表演講，主要是匯報該校現在的經辦情況，並衷心感謝北京各界的大力提倡與熱心資助。從其列舉的數字可清楚看到，婦女匡學會的捐款實為

1906年4月1日、2日，《惠興女士傳》首次在福壽堂開演，每次先有演說員對眾演說。以後此戲又移至廣德樓上演。這種演戲加演說的方式，因鼓動性強，在當年頗能產生感發觀眾的效力。5月27日的戲園中便出現了「忽聞哭聲起於南樓之下」，且「大號不止，警兵聞知，即前去勸解，方始停哭」的一幕。

其中的最大項，總計紋銀2,500餘兩，折合現洋為3,600餘元。如果再加上北京《中華報》主筆杭慎修(辛齋)等人代收的905元及金梁(錫侯)代收的小筆捐款，來自北京的捐助已遠遠超過了該校去年在當地得到的公私款項總和1,700餘元<sup>⑩</sup>。因此，也可以說，北京的資助是該校得以生存下去的堅實保障，而田際雲毫無疑問當列首功。

這裏，應該引用《大公報》記者的一段話了。在追溯惠興之死的意義與表彰北京伶界的仗義時，作者連續使用了幾個「嗚呼」，以表達心中鬱積的感慨。與北京伶人「憫女傑之殉身，慨學界之寡助，大動感情，擔任義務」相比，留給江南的感言則是：「嗚呼！江浙為財賦之區，以區區之女學，竟不能成立，致令惠興女傑憤懣憂傷，犧牲性命，以身殉學，以冀人之一悟，聞之興起。」由此而逼出如下的責難：「豈其長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優歟？」問題提得很有意思，回答卻不見得精彩。將江南紳學對惠興的普遍冷淡歸因為「鄉間之子，見聞之孤陋，意識之狹隘」<sup>⑪</sup>，無論如何總說不過去，杭州其他幾所民辦女校的健在便是證明。或許是英斂之的滿族背景，使他不願正視其間深藏的滿漢矛盾。

不過，惠興死事在北地與南方形成的巨大反差，倒確實表明清兵入關後征服江南的殘酷殺伐，在漢人心裏留下的陰影始終未能消除，於是，江南自然地成為晚清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根據地。而以吳三桂為引導的清軍，則是以為明朝復仇、剿滅李自成順軍的形式和平地進入北京，這也使得滿漢矛盾在北方相對和緩。由地域差別所顯示的民族歧見，在刊於《蘇報》的如下一段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sup>⑫</sup>：

中國者，世界上之黑暗區也；北京者，黑暗區中之黑暗地獄也。……舉全國之漢人，皆為滿洲遊牧之奴隸，而直隸人尤為滿洲遊牧之直接奴隸。北京為滿洲遊牧之巢穴，則北京漢人之奴隸性更可察矣。

假如剔除其間的貶斥意味，貞文女學校在北京獲得的同情，確實隱含着此一民族背景。

目前所知兩筆數額最大的私人捐款，即均出自旗人。時任盛京將軍的趙爾巽屬漢軍正藍旗，其夫人向婦女匡學會認捐二百兩<sup>⑬</sup>。出資最多的則推滿洲貴族婦女慧仙。慧仙母家姓額者特氏，她與丈夫承厚原有共同開辦學堂之志，偏偏承厚於1905年冬病故。「額者特氏，深痛無人幫助興學，哀慟的了不得。恰巧又聽得，杭州惠興女傑，因為創辦女學，款項不足，情急自殉，作為尸諫。額者特氏得了這個信息，愈加觸動感情，哀感病發，日重一日。自知病勢難愈，便向家中人，留下遺言，把所有家產，統通變賣，作為各學堂的經費。」其中便有「捐助杭州惠興女傑創辦貞文女學堂銀五百兩」<sup>⑭</sup>。就此一段敘述，也透出「物傷其類」的意味。

當然，大多數解囊相助者並不存滿漢成見，此處不過是想說明惠興事迹更容易在北京引起感動的社會基因。並非無人意識到其間的民族隔閡，只是北方的輿論界更願意將助款興學作為調和矛盾的手段加以提倡。《順天時報》於淑範女學校追悼會後，2月9日又刊載了〈申論學界報界開會追悼惠興女傑為調和滿漢界限助動力〉的專論，文章首先肯定：「現今中國社會第一大問題，是滿漢分界。」而作者「所最願贊成、最表同情的原旨」，是「可以調和滿漢的界限，可以融化滿漢

惠興死事在北地與南方形成的巨大反差，確實表明清兵入關後征服江南的殘酷殺伐，始終未能消除漢人心裏的陰影。《蘇報》中的一段話，十分清楚顯示南北地域差別的民族歧見：「全國之漢人，皆為滿洲遊牧之奴隸，而直隸人尤為滿洲遊牧之直接奴隸。」貞文女學校在北京獲得的同情，確實隱含着此一民族背景。

的成見，可以銷除滿漢的障礙，可以互結滿漢的團體」。在他看來，為惠興女士開追悼會，便可以發生這樣的大功用：

知有惠興女傑，不知有滿漢；爭拜惠興女傑，不暇分滿漢；追悼惠興女傑為興學死，便蓬蓬勃勃發起合群的思想；追悼惠興女傑為愛國死，便炎炎烈烈發起保種的熱誠。意在合群，滿漢是大群，還分甚麼滿和漢呀？意在保種，滿漢是同種，還分甚麼滿和漢呀？群越大，勢越厚，志士且要合東亞大群，還分甚麼滿和漢呀？種越強，力越厚，志士且要保全亞同種，還分甚麼滿和漢呀？所以這樣說來，學界報界開會追悼惠興女傑，實在是調和滿漢界限的大助動力。

不能說作者以紀念惠興為滿漢關係潤滑油的希望完全落空，但其效力畢竟有限。

#### 四 女傑死而學校興

在調和滿漢分界上，惠興之死雖然並未發生神奇的功效，但如果從整個中國女子教育發展的進程看，這一事件仍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是惠興親手創立的杭州貞文女學校確實從此起死回生。其去世後第二年的三月（約當西曆4月），該校重新開學，並「更貞文之名，為惠興女學堂，以志不忘」。貴林奉公舉委派為總辦，其母文安女士出任校長。到1907年5月，學校已有教員六人，學生六十人，課程分為十門，包括修身、讀經、歷史、地理、國文（兼習字）、算學、女紅、刺繡、唱歌及體操，設置相當完備，並正在建造洋式樓房五

大間、平房七間，以充校舍<sup>②</sup>。三多〈記惠興女傑為學殉身事〉一文結尾有云：「嗚呼！學校成矣乎？曰成矣。學校成而女傑死。嗚呼！女傑死矣乎？曰死矣。女傑死而學校興。學校興，女傑雖死猶生。」可謂定評。

自1904年開始在北京出現的女子教育萌芽，經過大張旗鼓地為貞文女學校募捐，表演、宣說惠興事迹，日益贏得社會各界的理解與同情，至1906年便推衍形成了興辦女學的高潮。翻閱這一年的《大公報》，有關京師新辦女校的動態接連不斷，以致記者產生了如下印象<sup>③</sup>：

自惠興女士一死，北京女學逐漸發達。如江亢虎所設之女學傳習所，大公主之譯藝女學堂，近者設婦女匡學會，雖優伶歌妓，亦動熱誠。……風氣之開，進而愈上，不禁為我中國前途賀也。

雖然兩所學校的創辦動議可能是在惠興自殺消息傳來前，但毫無疑問，兩校以及其他隨後擬議的女學堂，均借助這一宣傳聲勢迅速登場，如願以償。

如果考慮到「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學部女學堂章程頒布於1907年3月8日，則惠興殉學事件的發生也為爭取女子教育的合法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在京城引發的巨大反響，理所當然地成為推動清廷盡快承認女學的一股直接動力。1906年6月6日，內務府便曾傳集北京各戲班名角，「在頤和園敬演《女子愛國》及《惠興女士》新戲」。選定《惠興女士傳》入宮演出，本身即說明其人的辦學經歷已引起皇宮高層的注意。演出的現場效果雖未見記載，但「敬謹扮演」<sup>④</sup>之能感人，當不在話下。由此而得到普及和推廣的女學思想，也以民間辦學數量激增的既成事實，逼使政府對女子教育網開一面。

自1904年開始在北京出現的女子教育萌芽，經過大張旗鼓地為貞文女學校募捐，表演、宣說惠興事迹，日益贏得社會各界的理解與同情，至1906年便推衍形成了興辦女學的高潮。從整個中國女子教育發展的進程看，惠興之死仍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特別強調惠興創辦女學與以身殉學中的民族意識，並非有意貶低其興學的意義。惠興作為開創中國女子教育事業的先驅之一，自應在教育史上得到崇高的評價。筆者不過是希望從歷來被忽視的角度，對惠興之死的內因與心態作出更切近事實的解讀，並藉以勾勒晚清滿漢矛盾中滿族的命運。

所謂「女學堂風氣大開，各地遍設，故學部議定妥訂章程，俾資遵守」<sup>⑳</sup>，其間的因果關係已極為清楚。

本文特別強調惠興創辦女學與以身殉學中的民族意識，並非有意貶低其興學的意義。惠興作為開創中國女子教育事業的先驅之一，自應在教育史上得到崇高的評價。而其親手建立的女校長期存在（50年代後更名為杭州十一中，2000年5月又改稱「惠興中學」），杭州亦因此留下惠興路的地名，均是對其矢志辦學的最好紀念。筆者不過是希望從歷來被忽視的角度，對惠興之死的內因與心態作出更切近事實的解讀，並藉以勾勒晚清滿漢矛盾中滿族的命運。

### 註釋

① 共和復漢生：〈論中國民族主義〉，《警鐘日報》，1904年12月8日、10日。

② 《京報》，1902年2月1日。

③ 〈不融滿漢何以策中國〉，《盛京時報》，1907年3月7日。

④ 〈北京函述〉，《警鐘日報》，1904年5月30日。

⑤ 〈慷慨自盡〉，《盛京時報》，1906年12月28日。誤植之字已經改。下同，不再註。

⑥ 〈惠馨女士殉學記〉，《東方雜誌》，第3年第5期，1906年6月。

⑦ 〈本報十大特色〉，《警鐘日報》廣告，1904年11月14日起登載。

⑧ 〈滿婦奏興女學摺稿〉，《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日（原刊誤作1904年11月31日）。又，〈命婦羅皮氏呈請代奏派女生遊學摺稿〉，刊1904年12月29日同報。

⑨ 〈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申報》，1906年12月30日；並與《惠興女中》，第7期（1935年6月）所刊該校現存石刻文〈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士絕命遺眾學生書〉對勘。

⑩⑪ 〈三月二十六日惠興女學校總辦貴林在廣德樓戲館之演說〉，《北京女報》，1907年5月11日。

⑫ 〈戲價擬助女學堂經費〉，《申報》，1906年3月19日。

⑬ 1906年2月4日《大公報》有〈女追悼會〉消息一則：「日前，女報館張太夫人在陶然亭為杭州女士開追悼會。」另據《順天時報》1906年2月8日所刊〈補記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傑歷史〉，稱該會早於淑範女學校之追悼會一個月。

⑭ 〈記北京淑範女學校為惠興女傑舉行追悼會禮式〉，《順天時報》，1906年2月6日。

⑮ 〈劇資興學〉，《大公報》，1906年3月13日。

⑯ 見〈記婦女匡學會〉、〈演說創舉〉，《大公報》，1906年3月24日、5月30日。

⑰ 〈文明戲劇之感動力〉，《大公報》，1906年6月4日。

⑱ 〈新戲來津〉、〈名優愛國〉，《大公報》，1906年8月27日、9月13日。

⑲ 〈論演劇急宜改良〉，《盛京時報》，1907年5月4日。

⑳ 〈記惠興女傑為學殉身事〉記者談話，《大公報》，1906年3月14日。

㉑ 〈祝北京大學堂學生〉，《蘇報》，1903年6月6日。

㉒ 〈惠興女學捐款之踴躍〉，《大公報》，1906年5月11日。

㉓ 〈請看女傑布魯特額者特氏捐助學款二萬五千七百兩〉，《順天時報》，1907年1月19日。

㉔ 學部〈遵旨議奏惠興女士捐軀殉學請旌摺〉（題目係代擬），《惠興女中》，第7期，1935年6月；另參見〈三月二十六日惠興女學校總辦貴林在廣德樓戲館之演說〉及〈本校大事記〉，《惠興女中》，第2期，1934年12月。

㉕ 〈女學發達〉，《大公報》，1906年4月3日。實則譯藝女學堂的創辦者為謝祖沅。

㉖ 〈內廷演劇〉，《大公報》，1906年6月11日。

㉗ 〈女學亦訂章程〉，《大公報》，1906年5月28日。

夏曉虹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詩騷傳統與文學改良》、《晚清文人婦女觀》、《覺世與傳世》等。